

臺灣相對貧窮家戶的現況與變遷

陳建甫

中文摘要

本研究運用相對貧窮線與即將修正的低收入戶標準來分析台灣貧窮家戶的現況與變遷。資料來源是以民國七十三年至八十三年行政院主計處所調查的「台灣地區個人所得分配」之原始資料。研究發現這十一年來台灣相對貧窮人口比例維持在一六—二〇%間，貧戶率從民國七十六年的一三·五%，增加到民國八〇年的一六·七〇%，反映出台灣股市、房價飆漲，及財富快速累積的現象。近幾年來貧戶率已逐漸緩和，但在民國八十三年仍然有一四·一五%家戶或超過三百四十萬的貧窮家戶。其他重要的發現包括：(1)戶長之年紀越高、教育程度越低、或從事農業及非技術職業者有較高的機會淪為貧窮。(2)年輕女性單親家庭或老年女性雙親家庭淪為貧窮越來越嚴重。(3)鄉村持續貧窮問題依然存在，而隨著非都市貧窮家戶遷往都市以便獲得更多的社會福利與工作機會下，都市與城鎮貧窮問題將日趨嚴重。最後，未來研究應該強調勞動市場結構對家戶貧窮與地區貧窮率的影響，以及加強對低收入戶與隱性貧窮家戶特殊需要的瞭解，以作為研擬社會福利計畫的參考。

(關鍵詞：相對貧窮、低收入戶、隱性貧窮家戶)

Abstract

This study employed the measure of relative poverty and low income households to describe the profile and change of poverty households in Taiwan. The data used in this study came from the Survey of Personal Income and Distribution in Taiwan conducted by Directorate General of Budget Accounting and statistics during the period of 1983 to 1994. It has been estimated that the 16-20%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was living in poverty during the period. The poverty rate in households for 1987 was 13.5% increased to 16.7% for 1991. The increasing poverty rate may be consistent with the high price of stock, real estate and the wealth that was quickly accumulated. Although the poverty rate was slowly decreasing by 1994, there were over 3.4 million people still in poverty. The major findings included: (1) Household heads with aged people, lower educational level, working on farms and in non-technical occupations, who are more likely to be poor. (2) Female-headed households are more likely to be poor, particularly for the households of younger single mothers and aged female-headed households. (3) Poverty was most severe in rural areas, however, the occurrence of poverty is also increasing in urban areas because many poor people in rural areas may migrate to city areas to obtain better welfare benefits and to seek job opportunities. Finally, future areas for research on household poverty should focus on the influence of the labor market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which affects the economic well-being of households and local poverty. Furthermore, the unique needs of lower income households and latent poverty households should be understood in order to improve social welfare programs.

Keywords: Relative poverty, Low income households, Latent poverty households

壹、台灣貧窮研究的困境

回顧臺灣的貧窮研究，大多強調在「低收入戶」的人口、家戶特性的分析及致貧原因的解釋（林松齡，一九八〇，一九九一；陳淑英，一九八三；張清富，一九九二，一九九五）。所謂「低收入戶」係指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未超過最低生活費用者，而最低生活費用的訂定則是為前一年政府公布之家庭每人平均所得的三分之一（社會救助法，民國六十九年）。根據這項低收入戶最低生活費標準（註一），在民國八十四年臺灣地區低收入戶人口數不到臺灣總人口的百分之一，且低收入戶數正日漸減少當中（社會指標統計，一九九五）。許多學者批評目前決定低收入戶資格過於嚴苛，且最低生活費的標準根本無法維持一個人最基本的生存所需（林萬億，一九九四；黃進豐，一九九一）。

同時，貧窮研究的主題大多侷限在社會救助、個案輔導、以及那些無工作能力、或戶長身體有殘疾、或曾經遭遇重大變故的家庭（萬育維，一九九二）。然而，這種救濟式的貧窮研究經常忽略由社會、人口、產業結構的變遷與社會福利資源分配不當所產生的新貧窮階級，例如：鄉村貧窮、單親家庭、女性單親家庭（Bane, 1986; McLanahan 等，1988）、老人貧窮問題（萬育維與李孟修，一九九三）、以及許許多多辛勤工作卻仍處於貧窮情境下的工作貧窮（working but poor）（Elwood, 1988: 91; Leviton and Shapiro, 1987; 廖偉君，一九九二）。

因此，擺脫當前貧窮研究困境與發掘臺灣貧窮問題的本質，必須先從對貧窮的定義與測量來著手。在國內，許多學者已經考慮到貧窮的測量問題，也嘗試去設定新的貧窮線來檢驗台灣的貧窮問題。例如：陳琇惠（一九八六）重新計算絕對貧窮線，朱雲鵬（一九八七）使用低於一%與五%的「等成年男人」（Adult Male Equivalent, AME）平均收入作為貧窮線，溫秋蘭（一九九二）使用家戶收入的相對位置作為比較貧窮的依據。然而，這些貧窮測量研究仍有若干測量上的問題或解釋上的不足，例如：陳琇惠的貧窮標準無法解釋為什麼要除以恩格爾係數（ $1/3$ ）以及為何使用五%作為標準（林萬億，一九九四），朱雲鵬的研究無法解釋為什麼使用相當成年男人作為計算依據，以及溫秋蘭的研究無法顯示出多少的民衆與家戶是生活在貧窮環境中。

貳、研究目的

雖然，行政院院會已通過由內政部提出將最低生活費標準提高為家庭消費水準的六〇%（較目前標準約高三倍）（中國時報，一九九五，五月），但是，許多學者與立法委員已經提議使用相對貧窮的觀念來突破目前最低生活費所採用的「絕對貧窮」（註二）的困境，並指出應對不同性別、年齡、生理狀況、家庭規模、不同地區、物價指數等來衡量出一個人維生的最基本的需要（林萬億，一九九一；沈富雄，一九九五）。事實上，「相對貧窮」源自於一種對剝奪貧窮（Deprivation poverty）的概念，相對剝奪的貧窮並不

侷限在資源的取得，更廣泛的包括：物質、環境與社會情境。當一個人的消費水準、生活型態、或社會參與遠低於一般社會大眾的合理條件時，可稱其處在一種相對剝奪的貧窮環境中（Towsend, 1987, p. 125）。而「物質」與「社會」剝奪類型的比較可以說明相對剝奪的貧窮。例如：在「物質剝奪」方面，則是比較家戶的飲食、衣物、住宅、家具、環境與工作條件等；而在「社會剝奪」方面，則是比較受雇者的工作權利，家庭活動與社區參與，參與正式機構、娛樂與教育等（Towsend 等，1987）。

然而，在實際的運用上，相對貧窮的測量遭遇到相當多的困難，這是因為重新訂定一個「相對的」最基本生活所需標準去取代目前最低生活費的貧窮標準，必須結合營養、建築、織品、文化、環境、經濟、福利與社會學家等不同領域的專業學者來共同決定。在國外，許多福利經濟學者已經整合「相對剝奪」與「收入」的概念來測量相對貧窮；例如 Ravallion (1992) 建議使用百分之五十的平均家戶收入來做相對貧窮的標準。聯合國（一九九二：三十四）在「降低貧窮手冊」（Poverty Reduction Handbook）中，建議以百分之四十的平均家戶所得為標準。此外，許多西歐福利國家也紛紛採用此相對貧窮線來彌補絕對貧窮線的不足（Atkinson, 1992）。例如：在英國，訂定相對貧窮的測量為低於百分之五十之全國個人可支配所得，以作為另一種社會福利的指標（Department of Social Security, 1990）。法國則是訂定百分之五十或百分之六十的收入的中位數為相對貧窮的標準（Assenat and Glaude, 1989）。

。德國則以百分之四十或百分之五十的平均收入為相對貧窮的標準（Hauser and Seimrau, 1988）。

因此，本研究嘗試採用「相對剝奪」的觀念，以家戶所擁有資源（所得）的多寡來與全國平均家戶所擁有資源（所得）作比較，依照其所在的位置來分辨其資源是否相對的不足。當此家戶或個人所擁有的資源（所得）低於某一個標準之下時，便可稱其處在相對貧窮的狀況中。基本上，相對貧窮定義與測量的提出並不是要取代現有或即將修正最低生活費標準，而是提供另一個新的指標來協助學者與政府去瞭解台灣貧窮問題本質。相信透過相對貧窮的測量以及即將修正的最低生活費標準兩個貧窮指標，不僅可以明瞭低收入戶的貧窮特性，更可以對處於相對貧窮線與低收入戶最低生活費標準間的「隱性貧窮」家戶作一深入的分析。藉由事先瞭解這些處在相對貧窮下，卻無法獲得政府社會福利照顧的隱性貧窮家戶，將可以預防這些相對貧窮家戶陷入絕對貧窮的困境中。

因此，本研究將針對貧窮家戶經濟戶長的人口特性、家庭類型與居住區位等特性之現況與變遷加以探討，而主要研究目的，包括：

- 一、比較低收入戶、隱性貧窮家戶與貧窮家戶之貧窮標準。
- 二、明瞭貧窮家戶經濟戶長的人力資源、家庭類型與居住區位特性的現況。
- 三、探討貧窮家戶經濟戶長的人力資源、家庭類型與居住區位特性的變遷。

叁、研究設計與方法

一、資料來源

爲了比較相對貧窮與官方低收入戶（即將修正版本）兩種貧窮標準，以及明瞭隱性貧窮家戶的現況，本研究利用行政院主計處所調查的「中華民國台灣地區個人所得分配」之原始資料，並適當選擇從民國七十三年底至八十三年底的調查資料（註三）來作實證分析。

二、重要的變項與測量

貧窮家戶

貧窮家戶是指家戶個人可支配所得低於百分之五十的全國平均家戶個人可支配所得者。選擇所得而不是消費水準做為指標，是因爲消費水準僅僅反應出個人或家庭的生活型態，而非所有可獲得與支配的資源。家庭或個人可以因爲達成某種共同目標或生活習慣，而壓低消費支出，例如：許多貧困家庭縮衣節食地將部分收入予以儲蓄，這是因爲台灣社會欠缺社會福利政策與計畫，以及民衆普遍缺乏社會保險的觀念，造成儲蓄衍然成爲因應家庭意外發生的最好方式。此外，使用「可支配所得」（註四）來取代一般常用的「收入」，便是爲了區別出經常轉移性支出（例如：稅捐等）與財產淨額的影響。最後，以台灣地區平均家戶個人可支配所得來作爲測量

貧窮的標準，這是爲了反映不同地區（台北市、高雄市與台灣省）在同一相對貧窮標準下的貧窮關係，較能真實反應出不同地區的經濟、福利、產業與就業條件下的貧窮現況。

至於，平均家戶個人可支配所得的計算方式有三種：第一種以個人爲計算單位，將全國家戶可支配所得的平均數除以全國家戶平均人數，並考慮此家戶的加權係數，例如：主計處便是採用此種算法來計算全國個人可支配所得。由這種方式所計算的平均家戶可支配所得有偏低估計的傾向（表一），這是因爲這種算法將家戶的人口結構特性給相互抵銷所造成，例如：在貧窮家戶較多的人口可以分散到非貧窮家戶中。第二種算法則是以家戶爲計算單位，計算全國家戶個人可支配所得的平均數，並考慮此家戶的加權係數，例如：研究所提的修正加權結果。而第三種計算方法（本研究採用）是根據第二種計算方法，但是以原始家戶單位來計算家戶個人可支配所得，之所以不考慮此家戶的加權係數是爲了維持調查家戶單位的完整性。從其結果與第二種加權後平均家戶個人可支配所得的結果差距並不太。

低收入戶

低收入戶是指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年每月在最低生活費標準以下者。依照即將修正的社會救助法，最低生活費標準是由省（市）政府參照中央主計機關所公布當地最近一年平均每人消費水準的六〇%內訂定。由於此定義並未考慮到當年物價通貨膨脹的影響，因此，本研究將當期的消費水準與收入資料來作比較

表一 三種平均家戶個人可支配所得計算方式（單位：新台幣元／年）

	平均家戶個人可支配所得		
	第一種計算方式 個人為單位（加權）	第二種計算方式 個人為單位（加權）	第三種計算方式 個人為單位（加權）
民國73年	67,076.91	75,403.11	75,380.12
民國74年	69,800.85	78,178.26	78,159.94
民國75年	75,466.27	84,077.63	84,028.03
民國76年	83,062.30	91,591.13	91,019.64
民國77年	95,916.71	106,545.64	105,425.87
民國78年	109,479.25	121,065.52	119,821.75
民國79年	124,157.66	137,165.69	135,901.85
民國80年	141,134.11	157,982.80	156,783.56
民國81年	155,888.16	171,695.67	170,668.60
民國82年	177,719.95	193,813.08	193,147.91
民國83年	191,634.00	208,179.39	207,553.32

分析，並且以台灣地區平均家戶消費水準來代表台北市、高雄市與台灣省的消費水準。

隱性貧窮家戶

隱性貧窮家戶是指介於低收入戶與相對貧窮家戶間的家戶，這些隱性貧窮家戶是瀕臨官方貧窮線邊緣卻無法獲得政府社會福利津貼。

經濟戶長的人力資源

經濟戶長的人力資源是指家戶主要經濟收入者的人口特性，包括經濟戶長的年齡、教育程度與職業等。戶長的年齡以六個類別來區分為：十六歲—二十五歲、二十六歲—三十五歲、三十六歲—四十五歲、四十六歲—五十五歲、五十六歲—六十五歲及六十五歲以上。戶長教育程度以九年國民教育作為分界點，而分為低於高中（職）、高中（職）與高於高中（職）三類。戶長的職業共計分成十一種：（一）民意代表、行政主管、企業主管及經理人員，（二）專業人員，（三）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四）事務工作人員，（五）服務人員與售貨員，（六）農、林、漁、牧工作人員，（七）技工，（八）機械設備操作工組裝工，（九）體力工，（十）現役軍人，以及（十一）無職業者。

家庭類型

家庭類型是指依照戶長的婚姻狀況及是否有配偶劃分成五種家庭類型，包括：男性為經濟戶長的雙親家庭、女性為經濟戶長的雙

親家庭、男性為經濟戶長的單親家庭、女性為經濟戶長的單親家庭、以及一人生活的單身家庭。

居住區位

居住區位是指家戶所居住的地理位置，而地理位置可以依其產業結構特性來劃分為都市、城鎮與鄉村地區。根據行政院主計處的定義，村里內農、林、漁、牧、礦業之就業人口比例小於百分之二十五，且服務就業人口比例不小於百分之四十之村里為「都市」地區；「鄉村」地區是指村里內農、林、漁、牧、礦業之就業人口比例高於百分之四十五；至於其他地區則歸屬於「城鎮」地區。上述的區位劃分隱含著當地產業結構與勞動市場特性，鄉村地區多屬於第一級產業（農業為主）的勞動市場，而都市地區則屬於第三級產業（服務業為主）的勞動市場，至於城鎮地區則屬於第二級產業（製造業）的勞動市場。

三、研究方法

為探討貧窮家戶、低收入戶、隱性貧窮家戶的人口、家庭類型與居住區位特性，使用一般描述性統計方法（descriptive statistics）來加以分析。

肆、研究發現

一、貧窮家戶、低收入戶與隱性貧窮家戶之貧窮標準

表二 最低生活費、修正後低收入戶標準、貧窮線、貧窮與非貧窮家戶可支配所得與差距
（單位：新台幣元/年）

台灣省低收入戶最低生活費標準		修正後 低收入 戶標準	貧窮線	貧窮家戶 平均每人 可支配所得	非貧窮家戶 平均每人 可支配所得	差距
民國73年	23,400	34,714.31	37,690.06	29,694.74	83,319.02	53,624.28
民國74年	24,000	35,754.69	39,079.97	30,833.44	86,471.44	55,638.00
民國75年	25,200	37,894.12	42,014.02	33,529.54	92,224.79	58,695.25
民國76年	26,400	40,848.28	45,509.82	36,681.01	99,502.04	62,821.03
民國77年	28,800	46,342.06	52,712.94	41,732.78	116,387.39	74,654.61
民國78年	32,400	51,901.09	59,910.88	47,240.63	132,203.81	84,963.18
民國79年	38,400	57,833.42	67,950.93	53,539.23	160,979.82	97,440.58
民國80年	45,600	64,656.98	78,391.78	61,924.82	175,796.88	113,872.06
民國81年	50,040	70,688.00	85,334.30	67,241.02	189,050.46	121,809.44
民國82年	55,800	80,310.95	96,573.96	76,509.35	213,759.68	137,250.33
民國83年	60,000	88,252.88	103,776.16	83,871.15	227,944.92	144,073.77

隨著台灣經濟的發展，相對貧窮線與低收入戶最低生活費也逐漸上升。在民國七十三年，相對貧窮線的標準僅為每年三七、六九〇元（每月平均約為三、一四一元），而在早期階段（民國七十三年至民國七十六年期間），相對貧窮線大約是以每年二千元至三千元範圍在增加。但是，在近六年期間（民國七十七年至民國八十三年），則以七千元至八千元快速倍增。至於，貧窮與非貧窮家庭的平均個人可支配所得差距亦迅速地在擴大。在民國七十三年，兩者差距大約僅為五三、六二四元，然而，在僅僅五年當中（在民國七十七年），其差距增加到七四、六五四元（約成長四〇%）；而到了民國八十三年，其差距更增加到一四四、〇七四元（約為一八〇%）。這種貧窮與非貧窮家庭個人可支配所得的差距，充分反映出台灣地區近幾年嚴重財富不均的社會現象（表二）。

而在這十一年當中，貧戶率（貧窮家庭占全國所有家庭的百分比）大致維持在一三·五%到一六·七%之間。（表三）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民國七十六年貧戶率為近十年來的最低點一三·五〇%。然而隨著股票指數的飛漲，貧戶率亦隨之升高，到民國八〇年達到最高點一六·七〇%。這種現象反映出在七十六年與八〇年期間，因股市與房價飆漲、財富的快速累積之下，造成更多家庭（約三·二%）淪為貧窮的困境中。此外，由於貧窮家庭的平均人口較非貧窮家庭來得高，因此，若是換算處在貧窮狀況的人口數，則發現貧民率（貧窮人數約佔全國總人數的百分比）由民國七十六年的一六·八五%，迅速增加到民國八〇年的二〇·二三%。直到民國

表三 貧窮家庭戶數（低收入戶、隱性貧窮家庭）、貧戶率（%）以及貧窮家庭人口數與貧民率（%）*

	低收入戶	貧窮家庭與貧戶率		貧窮家庭人口數 與貧民率
		隱性貧窮家庭	小 計	
民國73年	1,298(7.90)	1,135(6.91)	2,433(14.80)	14,488(18.81)#
民國74年	1,278(7.78)	1,177(7.16)	2,455(14.94)	14,235(18.85)
民國75年	1,077(6.55)	1,218(7.41)	2,295(13.96)	13,137(17.65)
民國76年	1,030(6.27)	1,189(7.24)	2,219(13.50)	12,229(16.85)
民國77年	994(6.05)	1,419(8.63)	2,413(14.68)	12,889(18.30)
民國78年	883(5.37)	1,512(9.20)	2,395(14.57)	12,357(17.68)
民國79年	832(5.06)	1,711(10.41)	2,543(15.47)	12,854(18.67)
民國80年	796(4.84)	1,948(11.85)	2,744(16.70)	13,842(20.23)
民國81年	720(4.38)	1,760(10.71)	2,480(15.09)	12,042(17.87)
民國82年	703(4.28)	1,765(10.74)	2,468(15.02)	11,688(17.39)
民國83年	591(3.60)	1,735(10.56)	2,326(14.15)	10,951(16.60)

*：每年皆有16434戶抽樣戶

#：貧窮家庭人口數除以當年總家庭人口的百分比

八十三年，貧民率才逐漸下降到一六·六〇%。若推估台灣全體總人數，在民國八十三年，台灣地區約有三百四十萬人是生活在貧窮的狀況中。

若是根據即將修改的社會救助辦法，在民國七十三年，低收入戶的最低生活費用為每年三四·七一四·三二一（相當於每月二、八九二·八三元），低收入戶的貧戶高達七·九〇%（為近十一年來最高的一年），而在民國八十三年，最低生活費雖然已經增加到八八·二五二·八八元（相當於每月七·三五四·四一元），但是低收入戶的貧戶率卻下降至三·六〇%（見表二與表三）。儘管，即將修正的低收入戶標準已經放寬最低生活費的標準，且接受社會福利照顧的家戶數也由〇·五%—〇·九%家戶大幅的增加到三·六%—七·九%。然而，從資料結果以及與相對貧窮標準做一比較後，顯示這項低收入戶最低生活費標準並不能靈敏反映台灣的貧窮狀況，符合此最低生活費標準的低收入家戶數明顯隨著台灣經濟的發展而日益減少。這是因為這十幾年家戶經常性消費支出並沒有明顯大幅的增加，歷年來通貨膨脹皆維持在五—七%上下，高儲蓄率壓縮家庭消費支出，以及貧窮家戶收入與消費結構有越來越往中央的趨向，以致家戶平均收入遠高於最低生活費標準。若是按照原先條文不考慮當期的物價通貨膨脹率，以前一年的消費水準來訂定當期低收入戶的最低生活費，則即將納入社會福利網的低收入戶數將更為稀少。因此，對於以家戶平均消費水準的六〇%為最低生活費用的計算方式，將值得有關單位進一步去思考。

雖然，比較台灣貧窮家戶的比例與其他歐美先進國家的貧窮相差並不太大（例如：近十年來美國的貧窮率同樣維持在一四%—一六%），但是，台灣的貧窮戶與歐美貧窮家庭所過的生活是截然不同的。在歐美各國，這些淪為貧窮的家庭不僅可以獲得基本的生活照顧、或是因戶長失業而領得失業補助以及介紹工作等福利，同時，這些貧窮家庭之婦女與幼兒皆享有各項的社會福利與醫療資源的照顧。但是在台灣地區，在全國一六·六%人口的貧窮家戶中，僅只有〇·五四%不到的人口符合國家低收入戶的標準並獲得某些社會福利的資源，但是卻有一六%的貧窮人口是生活在現行社會福利網以外。在未來，即使通過以即將修正的最低生活費用標準，但是，保守估計仍然將有一〇—一%的隱性貧窮家戶無法獲得任何的社會福利單位的協助。這些貧窮家戶與其家人必須因家庭經濟收入的不足，而擔負社會種種不公平的待遇，例如：犧牲子女接受較好教育與照顧的機會、以及其他社會、文化參與的機會。

二、台灣貧窮家戶的特性與現況

為了進一步瞭解這些低收入戶與隱性貧窮家戶的特性與現況，本部分將針對經濟戶長的人力資源、家庭類型與居住區位等特性加以探討。這是因為人力資源理論強調調戶長因年齡、教育程度與職業類型的差異，而導致家庭經濟的不足與缺乏，使家庭淪落貧窮的困境；此外，隨著新型態家庭類型的興起，例如：經濟戶長為女性的雙親家庭、女性單親家庭與未婚媽媽家庭等，往往影響家庭是否淪為貧窮的主要原因之一；而透過對貧窮家戶的居住區位的分析，將

提供一個完整的輪廓來檢驗台灣區位的不公平現況。

(一)貧窮家戶經濟戶長的人力資源

經濟戶長個人特質的解釋主要是基於「人力資源」的理論觀點。人力資源學派認為貧窮是因為個人工作經驗或能力的不足，導致失業或從事較低收入的工作。因此，人力資源學派強調透過增加教育與工作訓練，以及鼓勵參與勞動市場，特別是增加婦女就業率來增加家庭的收入，進而減少家庭淪為貧窮的機會（Becker, 1964）。在此，就經濟戶長的年齡、教育程度與職業來加以探討。

年齡與貧窮週期

人力資源理論認為，工作經驗將隨著年紀的增長而增加。當人力剛投入勞動市場時，由於欠缺工作經驗，此時薪資最少；隨著工作經驗的累積則薪資將隨之增加；在最後階段，工作薪資則因退休而隨之減少。因此，在剛開始工作與退休兩個階段因薪資較少或僅領退休金而可能遭遇較高的貧窮機會。此外，Lipton (1988) 則提出「家庭的貧窮週期」的解釋，他指出一對夫妻終其一生有三個階段最容易淪為貧窮：小孩出生時、開始就業及小孩離開時。這種家庭貧窮週期與 Townsend (1965) 所提的個人貧窮週期：兒童時期、結婚生子、老年期非常接近。這些貧窮週期的論點皆是探討經濟戶長的年齡（或生命週期）與貧窮間的關係。

在民國八十三年，三十六—四十五歲與六十五歲以上的戶長年齡層有較高的比例落入低收入戶與隱性貧窮的狀況中。其中，高齡

戶長的落入低收入戶的比例高達八·六八%，是三十六—四十五歲年齡層（四·〇九%）的兩倍多，而大約每七家高齡家戶便有一家淪為隱性貧窮的狀況中（表四）。這種現象反映出，高齡經濟戶長對政府社會福利機構救濟的迫切性。若是能夠針對這些處在隱性貧窮狀況下的高齡經濟戶長提供適時的協助，將可避免這些高齡經濟戶長淪落到低收入戶的狀況。

教育年數與貧窮

「人力資源」理論同時強調可藉由增加教育與訓練的機會，改善人力勞動的品質，進而增加工作收入並減少家戶淪為貧窮的機會。研究結果顯示，在民國八十三年，經濟戶長擁有高水準的人力資源（大專與大學以上）較不容易淪為貧窮的狀況（二·六四%）中，而戶長僅具有國中或以下教育程度的家戶有較高的機會淪為低收入戶（五·七四%）與隱性貧窮家戶（一四·七九%）狀況。這項發現符合人力資源論點的預期。

職業與貧窮

經濟戶長的就業狀況（是否就業）或工作收入的多寡是導致貧窮的主要因素之一。當工作者擁有較高的技術與職業訓練通常獲得較高的經濟報酬，相反的，擁有較低的技術或從事無技術的職業則容易淪為貧窮狀況下。因此，「好的工作使得家庭遠離貧窮，缺乏工作將造成家庭貧窮」（Schiller, 1989: p. 44）。然而隨著產業與薪資結構的調整與改變，越來越多的家庭戶長雖然終年辛勤的工作

表四 民國83年貧窮與非貧窮家戶戶長人力資源、家庭類型與居住區位特性#

	相對貧窮家戶		
	低收入戶	隱性貧窮家戶	非貧窮家戶
經濟戶長的人力資源			
性別			
男性戶長	462(3.25)	1521(3.25)	14,197(86.39)
女性戶長	129(5.77)	214(9.57)	2,237(13.61)
年齡			
25歲及以下	18(2.88)	50(8.01)	556(89.10)
26歲-35歲	114(2.82)	441(10.92)	3,485(86.26)
36歲-45歲	127(4.09)	650(11.72)	4,668(84.18)
46歲-55歲	53(1.74)	197(6.48)	2,790(91.78)
56歲-65歲	61(3.34)	188(10.30)	1,576(86.36)
65歲以上	118(8.68)	209(15.37)	1,033(75.96)
教育程度			
國中及以下	489(5.74)	1261(14.79)	6,774(79.47)
高中(職)	87(1.98)	396(9.03)	3,904(88.99)
大專及以上	15(0.43)	78(2.21)	3,430(97.36)
職業			
行政主管、民意代表	2(0.16)	23(1.87)	1,205(97.97)
企業主管與經理者			
專業工作者	0(0.00)	10(1.08)	915(98.92)
技術員與助理專業者	7(0.37)	84(4.40)	1,817(95.23)
事務工作者	8(0.88)	38(4.18)	864(94.95)
服務工作與售貨員	66(2.83)	232(9.94)	2,036(87.23)
農林漁牧業者	133(9.33)	302(21.19)	990(69.47)
技術工作者	93(3.06)	398(13.11)	2,546(83.83)
機械設備操作與			
組裝工作者	77(3.51)	297(13.56)	1,817(82.93)
體力工作者	53(5.62)	146(15.48)	744(78.90)
軍人	0(0.00)	0(0.00)	153(100.00)
無業者	152(11.03)	205(14.88)	1,021(74.09)
家庭類型			
男性雙親家庭	409(3.40)	1390(11.56)	10,225(85.04)
女性雙親家庭	55(7.53)	80(10.96)	595(81.51)
男性單親家庭	35(2.34)	95(6.38)	1,359(91.27)
女性單親家庭	55(5.36)	109(10.62)	862(84.02)
單身家庭	37(3.18)	61(5.24)	1,067(91.59)
男性單親家庭*	16(4.06)	38(9.64)	340(86.29)
女性單親家庭*	38(7.05)	71(13.17)	430(79.78)
單身家庭*	25(4.05)	41(6.63)	552(89.32)
居住區位			
都市地區	192(2.03)	679(7.71)	8,593(90.80)
城鎮地區	193(4.26)	584(12.89)	3,753(82.85)
鄉村地區	591(8.44)	472(19.34)	1,762(72.21)

#：貧戶戶數（貧戶率%）

*：扣除未婚戶長及配偶為戶外人口之家戶，僅包括：同居、離婚、分居與寡居者

作，卻無法擺脫貧窮的困境。這種工作貧窮問題已經成為近幾年研究者所關注的議題。

在民國八十三年，家戶經濟戶長沒有就業確實容易讓家戶淪落於貧窮的困境中，特別是在低收入家戶，高達一五二戶（二五·七%）的經濟戶長根本沒有就業。而在這些已就業的經濟戶長家戶中，則是以農民與非技術性體力勞動者淪落為低收入戶的機會最高，此外，農民、無技術與體力工作者、機械與設備工作者與技術生產工作者淪為隱性貧窮的機會遠高於其他職業工作者。除了農民是屬於自營者外，其他三種職業類型大致可以歸類為藍領階級的工作者。由於這些工作平均薪資偏低，且每月工作時數較不穩定，因此，造成從事這些職業類型戶長的家戶，有較高的機會淪為貧窮的困境中。

值得注意的是，在非藍領職業工作中，戶長從事服務與售貨員職業的家戶淪為隱性貧窮家戶的機會相當地高（九·九四%）。這項發現提供另一個警訊，在未來台灣產業結構逐漸朝向以服務業代替製造業的同時，這一類無需專業技術或無鉅額資本的服務與售貨工作機會將會日益增加。基本上，這些服務與售貨類型的職業通常具備比較彈性的工作條件（不需工作經驗或無年齡限制等），以及提供一個較為「安逸」的工作環境（百貨公司或便利商店），但是，這些工作薪資通常僅維持在一基本工資，或按照銷售量來訂定薪資。因此，在這類以銷售或服務業的勞動市場結構中，容易造成許多就業終年辛勤工作，但是卻是生活在貧窮的邊緣。同時，由於

本身缺乏生產技術，一旦市場經濟稍為不景氣，便會立刻臨到失業與淪為貧窮的困境中。因此，在適當時刻提供適時的協助（市場不景氣），將可以避免這些從事銷售與服務業戶長的家戶，淪落到低收入戶的困境。

（二）家庭型態與貧窮

許多研究已經注意到家庭結構的改變影響到家庭貧窮（Bane, 1986; McLanahan, 1985）。在國外，「女性貧窮」的概念（Feminization of Poverty）已被廣泛使用描述女性單親家庭（Pearce, 1978）。許多研究發現，女性單親家庭經常面臨貧窮的困境，這是因為女性戶長賺錢能力的普遍低落，家庭缺乏丈夫的工作收入，以及不足夠的社會福利導致女性家庭易淪為貧窮的環境下（McLanahan, et al., 1988; Garfinkel and McLanahan, 1988）。

在台灣，雖然有些研究已經以個案輔導方式來分析女性低收入戶的研究，但是對其他女性單親家庭與未婚媽媽家庭的研究仍嫌不足（莊淑晴，一九九一）。這是因為未婚媽媽或離婚婦女仍然可以獲得原先家庭內部成員的支持、或搬回娘家中居住，而屬於寡母與孤子的女性單親家庭通常也可以納入夫家的家庭體系中獲得基本的照顧，同時，現行的社會福利措施並沒有針對女性單親家庭提供特別的協助，使得女性貧窮問題的嚴重程度通常被忽略。

事實上，女性單親家庭已經成為主要的貧窮家庭類型。在民國八十三年，有七·〇五%的女性單親家庭淪為低收入戶，並且有一三·一七%淪為隱性貧窮的困境中（表四）。除了女性單親家庭外

，經濟戶長為女性的雙親家庭有相當高比例淪為低收入戶（七·五三％）與隱性貧窮困境中（一〇·九六％）。婦女之所以能夠成為雙親家庭的經濟戶長，往往是因為家戶中丈夫無法提供充足的經濟資源、或根本不具備工作能力，這結果經常造成這些女性經濟戶長面臨較嚴重的經濟壓力。

家庭類型、戶長年齡與貧窮

為了探討哪一個年齡層家庭類型容易淪落在貧窮的困境，本研究特別就民國八十三年資料加以分析（表五）。結果顯示，貧窮週期的現象存在不同家庭類型家戶當中，貧窮高峰分別出現在二十六—三十五歲、三十六—四十五歲以及超過六十五歲以上三個年齡層。值得關切的是，所有的高年齡的經濟戶長皆面臨較高的經濟壓力，其中特別是對於老年的女性雙親家庭，每三個家戶便有一家淪為貧窮的困境中（三五·七一％）。一種合理的解釋是，這些年老婦女之所以能夠成為家庭的經濟戶長，大多是因為家戶中年老丈夫大多已經不具備工作或經濟的能力所致。此外，大約每六個單身的老年家庭，便有一位是淪為貧窮的困境。在未來，這些獨居的單身老年人所引發的貧窮問題將隨著台灣人口結構的邁向高齡化後越加普遍。

在以女性為經濟戶長的雙親或單親家庭中，其淪為貧窮的年齡層與類型也不盡相同。在女性雙親家庭中，則以二十六—三十五歲、三十六—四十五歲與超過六十五歲三個階段最容易淪為貧窮中。除了是因為在青壯年時期（二十六—四十五歲）家庭必須擔負較

表五 民國83年不同家庭類型與年齡別戶長家戶淪為貧窮的戶數與貧戶率（％）

	雙親家庭		單親家庭*		單身家庭*
	男性戶長	女性戶長	男性戶長	女性戶長	
25歲及以下	20(14.08)	0(0.00)	0(0.00)	0(0.00)	0(0.00)
26歲-35歲	442(15.67)	31(26.05)	8(13.33)	25(27.47)	0(0.00)
36歲-45歲	715(16.00)	57(22.71)	27(18.75)	51(20.90)	0(0.00)
46歲-55歲	197(8.03)	21(10.00)	6(6.98)	14(11.48)	3(4.11)
56歲-65歲	199(14.55)	11(10.28)	7(10.77)	12(23.08)	10(7.09)
65歲以上	226(29.24)	15(35.71)	6(16.22)	7(24.14)	53(16.41)

*:扣除未婚戶長及配偶為戶外人口之家戶，僅包括：同居、離婚、分居與寡居者

大的子女教養的經濟壓力外，家中丈夫並沒有擔負主要家庭經濟的能力，例如：丈夫尚在就學、服役或者根本就臥病無法工作等，皆有可能造成女性雙親家庭經濟能力的不足。相較之下，對於女性單親家庭而言，除了在青年、壯年階段（二十六—三十五歲與三十六—四十五歲），必須面臨較大的子女教養壓力外，在中晚年（五十六—六十五歲）階段，往往是因為家庭發生變故，例如：喪偶或離婚等，容易造成這些女性單親家庭淪為貧窮狀況中，並提早進入老年貧窮（超過六十五歲以上）的困境中。因此，如何提供階段性的社會救濟與職業訓練服務機會，來鼓勵或訓練這些中晚年婦女重新投入就業市場，將可以適時的降低中晚年女性單親家庭淪為貧窮的機會。

（三）城鄉不均發展與貧窮

探討貧窮家戶的居住區位將有助於瞭解台灣貧窮家戶的地理分佈與城鄉貧窮差異的現況。在民國八十三年，八·四四％的鄉村家戶淪為低收入戶的困境中，並且有一九·三四％家戶淪為隱性貧窮的狀況中（表四）。如此高的鄉村貧窮反映出因農業產業結構缺乏競爭能力或因區位結構的差異所形成的問題（Tickamyer and Duncan, 1990; Lobo, 1990）。此外，都市地區具有較低的低收入戶與隱性貧窮家戶的貧戶率，部分是由於都市地區的家戶具有較高的平均收入或可支配所得，因此，淪落貧窮的機會遠低於鄉村與城鎮地區的家戶。而從地區貧戶率的差異更驗證台灣城鄉地區的不平衡發展。事實上，這種都市優先或「都市偏差」（Urban Bias）的觀念（

Lipton, 1972）早已存在政治、經濟、文化、與福利政策中，因此，鄉村居民的經濟與福利經常被執政者或社會大眾所忽略。醫療資源的分配便是一個相當明顯的例子，在台北都會區能夠擁有一流的醫療、衛生設施，但在花蓮、台東鄉村地區卻缺乏相關的醫療福利等設施。（蔡宏進，一九九四）

二、台灣貧窮家戶的變遷（民國七十三年至民國八十三年）

本部分利用民國七十三年至民國八十三年的資料來分析近十一年來台灣貧窮家戶的變遷過程，透過對家戶經濟戶長人力資源、家庭類型、與居住區位的分析，除了可從社會變遷的觀點來觀察貧窮家戶的特性外，並可以作為台灣貧窮家戶未來變遷趨勢的參考。

高齡化的貧窮趨勢

若從一長期的趨勢來觀察，台灣高齡貧窮問題將日益嚴重。老年經濟戶長家戶淪為貧窮的機會，從民國七十三年的一六·一八％增加到民國八十三年的二四·〇四％。幾乎每四位處在老年階段（超過六十五歲以上）的經濟戶長，便有一位是處在貧窮的困境中，遠高於必須擔負子女教養的壯年層（三十六歲至四十五歲）（表六）；相反的，壯年經濟戶長家戶淪為貧窮的機會，卻從民國七十三年的一九·六八％下降到民國八十三年的一五·八二％。這結果凸顯兩個重要的含意：一是隨著台灣人口結構的老化，老年貧窮問題將日益嚴重；另一則是隨著家庭人數的降低（特別是幼兒人口），將減緩壯年經濟戶長家庭經濟的負擔。

表六 不同年齡經濟戶長之貧窮家戶與貧戶率（%）

	25歲及 以下	26歲～35歲	36歲～45歲	46歲～55歲	56歲～65歲	65歲以上
民國73年	128(12.16)	838(15.71)	844(19.68)	363(10.93)	171(9.07)	89(16.18)
民國74年	115(12.55)	850(16.13)	843(19.54)	333(10.40)	201(9.56)	113(17.97)
民國75年	96(10.31)	786(14.98)	798(18.39)	308(9.95)	197(9.15)	110(16.39)
民國76年	94(11.27)	713(14.18)	744(17.34)	287(9.20)	200(9.14)	151(18.85)
民國77年	96(12.90)	724(14.50)	864(18.45)	316(10.39)	233(11.00)	180(21.10)
民國78年	92(12.78)	676(13.81)	853(17.50)	307(10.24)	259(12.87)	208(22.29)
民國79年	86(12.11)	723(15.11)	898(18.42)	329(10.80)	263(13.03)	244(24.42)
民國80年	92(12.47)	800(17.03)	1,045(19.59)	305(11.15)	259(13.41)	243(24.37)
民國81年	86(13.37)	645(14.61)	926(16.62)	296(10.54)	251(13.44)	276(24.47)
民國82年	60(9.77)	591(14.37)	944(16.69)	277(9.48)	265(14.32)	331(25.94)
民國83年	68(10.75)	555(13.74)	877(15.82)	250(8.22)	249(13.64)	327(24.04)

表七 不同教育程度經濟戶長之貧窮家戶與貧戶率（%）

	國中及以下	高中(職)	專科及以上
民國73年	2,115(20.76)	274(7.72)	44(1.63)
民國74年	2,141(20.73)	272(7.82)	42(1.60)
民國75年	1,981(19.39)	261(7.48)	53(1.94)
民國76年	1,876(18.52)	291(8.09)	52(1.92)
民國77年	2,014(20.35)	337(9.13)	62(2.18)
民國78年	1,983(20.47)	338(8.66)	74(2.60)
民國79年	2,078(22.17)	391(9.83)	74(2.40)
民國80年	2,171(24.28)	475(11.30)	98(2.98)
民國81年	1,957(22.11)	444(10.51)	79(2.35)
民國82年	1,930(21.98)	459(10.79)	79(2.32)
民國83年	1,750(20.53)	483(11.01)	93(2.64)

中等教育程度戶長淪為貧窮機會大增

教育程度對貧窮家戶的影響似乎有減弱的趨勢，在民國七十三年，擁有國中及以下學歷的經濟戶長的家戶淪為貧窮的機會是擁有高中及以上學歷經濟戶長家戶的一二·七倍。然而，在民國八十三年，這個比例卻下降到七·八倍。此外，經濟戶長為高中（職）教育程度的家戶淪為貧窮的機會，也從民國七十三年的一七·七%逐漸

年增加到民國八十三年的一一・〇％，這現象除了反映出台灣地區教育水準的提昇，也說明中等水準的人力資源條件（高中（職）教育程度）已經不能夠保證會脫離貧窮的困境。（表七）

工作貧窮日益嚴重：農民與藍領階級工作貧窮

除了因戶長沒有就業容易淪落貧窮外，不少職業類型的工作者一直面臨相當高的貧窮壓力，例如：農民、體力工作者、機械設備操作與組裝工作者、以及技術工作者。其中值得關切的事，雖然貧窮率已經從民國八〇年的一六・七〇％（最高點），下降到民國八三年的一四・一五％，但是對於這些機械設備操作與組裝工作與體力勞動工作者的家戶，貧窮問題並沒有獲得改善，仍然維持民國八〇年的最高貧窮的水準（一七・〇七％與二一・一〇％）。一個可能的原因是由於近幾年來外在勞動市場結構與勞動人力需求的改變所致，例如：勞力密集產業的出走、經濟不景氣與工廠的倒閉、房地產的不景氣、以及外籍勞工的引進等，皆可能讓這些機械設備操作與組裝工作者與體力工作者，面臨就業機會短缺、工作時數或薪資不足的問題（表八）。

此外，農家的高貧窮率（一直維持在三十％以上）反映出農業產業在整個勞動市場競爭能力的不足。隨著台灣工商業的快速發展，現今農家所得遠低於非農家所得早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而非農業所得已經成為農家的主要收入來源（余玉賢，一九七八）。雖然，許多農業政策嘗試去協助農民，降低經營成本來增加農家收入，然而，並無法提昇農業產品在市場上的議價與競爭能力。近幾年

表八 民國73、76、80與83年不同職業別經濟戶長之貧窮家戶與貧戶率（％）

	民國73年	民國76年	民國80年	民國83年
專業工作者	18(1.59)	18(1.77)	23(3.23)	10(1.08)
行政主管、民意代表				
、企業主管與經理者	7(0.94)	10(1.27)	18(2.11)	25(2.03)
技術員與助理專業者	71(3.36)	67(3.36)	84(4.15)	91(4.77)
事務工作者	230(10.35)	204(9.16)	324(13.97)	46(5.05)
服務工作與售貨員	139(11.45)	117(10.40)	194(14.72)	298(12.77)
農林漁牧業者	855(37.48)	698(33.70)	648(40.78)	435(30.53)
技術工作者	812(18.39)	780(16.55)	967(20.93)	491(16.17)
機械設備操作與				
組裝工作者	102(10.85)	89(10.25)	151(17.26)	374(17.07)
體力工作者	72(18.32)	69(14.56)	85(21.36)	199(21.10)
軍人	8(2.76)	6(2.65)	2(0.94)	0(0.00)
教師或其它無法歸類	3(100.00)	0(0.00)	8(1.81)	0(0.00)
無業者	116(16.71)	161(17.24)	240(22.43)	357(25.91)

來，政府基於選舉的壓力，若干針對農民的福利措施紛紛出籠，農民保險、老農年金津貼等措施多少改善農家的經濟。此外，在農政單位積極鼓勵不具競爭能力的農民轉業措施之下，農家戶數從民國八〇年的一五八九戶減少到民國八十三年的一四二三戶。再加上外在社會經濟環境與貧窮率的減緩，使得農家的貧窮率能夠由民國八〇年的四〇・七八%，下降到民國八十三年的一三・五三%。然而，在未來幾年，台灣即將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國際市場的競爭將直接打擊台灣的農業與鄉村的經濟，農家的貧窮問題勢必日趨嚴重，如何透過鄉村重整的過程（rural restructuring），讓農業與鄉村其它產業共同整合來應付國際的競爭壓力，將是解決農家與鄉村貧窮的重要關鍵。

女性貧窮問題日益嚴重

經濟戶長為女性的家庭已經成為主要的貧窮家庭類型，特別是女性單親家庭。從民國七十七年至民國八十三年，女性單親家庭淪為貧窮的狀況一直是維持在二〇%與二五%之間（註五）。此外，在經濟戶長為女性的雙親家庭中，有相當高比例淪為貧窮困境中（約一七%—一九%），這結果反映出，由於丈夫無法提供充足的經濟資源或無工作能力，造成這些女性經濟戶長必須面臨嚴重的經濟壓力（表九）。在未來，隨著婦女大量的投入勞動市場，婦女能夠獨力負擔家庭的生活需求，以及在傳統家庭觀念的解組與社會規範的日益淡化下，這些女性單親或雙親家庭將會越來越多。然而，大多數的女性就業通常集中在較低報酬的次要勞動市場（Tickenyer and

表九 不同家庭類型家戶淪為貧窮的戶數與貧戶率（%）

	雙親家庭		單親家庭*		單身家庭*
	男性戶長	女性戶長	男性戶長	女性戶長	
民國77年	1,973(15.61)	105(17.74)	59(16.25)	88(22.56)	31(7.28)
民國78年	1,933(15.38)	109(18.47)	62(17.56)	91(20.54)	42(9.98)
民國79年	2,027(16.52)	115(18.00)	65(17.86)	93(21.18)	56(11.16)
民國80年	2,198(17.82)	125(19.29)	52(15.29)	126(26.42)	60(13.13)
民國81年	1,939(15.87)	112(19.02)	66(16.84)	114(21.76)	81(14.67)
民國82年	1,893(15.66)	116(17.63)	71(17.19)	139(25.41)	64(11.47)
民國83年	1,799(14.96)	135(18.49)	54(13.71)	109(20.22)	66(10.68)

*:扣除未婚戶長及配偶為戶外人口之家戶，僅包括：同居、離婚、分居與寡居者。

Bokemeier, 1988)，在欠缺丈夫工作報酬以及目前並沒有針對女性單親家庭的公共社會福利津貼之下，女性單親家庭勢必容易淪為貧窮狀態之中。

貧窮的地理分佈：鄉村、城鎮、都市貧窮的消長

鄉村貧窮問題已經隨著人口的遷移、鄉村工業區的建立、從農人口逐漸降低、新市鎮的興起等方式有逐漸改善的趨勢，從民國七十三年，有四七·三%（最高點）的貧窮家戶是居住在鄉村地區，降到民國八十三年的一九·一五%，同時，鄉村貧窮家戶在整個鄉村家戶的比例也從民國七十九年的三五·〇四%（最高點）降到民國八十三年的一七·七九%。但是，相較之下，近二年來都市地區的貧窮家戶在數量上與比例上卻有增加的趨勢，不管在貧窮家戶的總數上或是都市總家戶的比例上，都市居民的貧窮問題已變得分外明顯，例如：從民國七十三年，有二三·九六%的貧窮家戶是居住在都市，但是，到民國八十三年卻增加到三七·四五%，以及貧窮家戶佔都市總家戶比例，亦從民國七十三年的一六·五七%增加到民國八十三年的一九·二%（表十）。

鄉村與城鎮貧窮家戶往都市地區遷移是一合理的解釋。根據遷移的法則，非都市貧窮家戶遷移至都市，是因為來自都市的正向吸力或是來自鄉村負向的推力遠高於來自鄉村的正向吸力或來自都市的負向推力。而比較具體的推力或吸力，與最近北、高兩直轄市紛紛實行多種社會福利措施有關，例如：敬老年金的發行與〇—三歲幼兒健保免費等措施，吸引許多貧窮家庭遷往北、高兩市。此外，

表十 不同地區家戶淪為貧窮的戶數、貧窮家戶比例（%）與地區貧戶率（%）

	貧窮家戶與比例（%）			地區貧戶率		
	都市地區	城鎮地區	鄉村地區	都市地區	城鎮地區	鄉村地區
民國73年	583(23.96)	699(28.73)	1,151(47.31)	6.57	17.89	31.52
民國74年	627(25.54)	720(29.33)	1,108(45.13)	7.06	18.23	30.75
民國75年	653(28.45)	699(30.46)	943(41.09)	7.17	16.75	29.96
民國76年	569(25.64)	706(31.82)	944(42.54)	6.24	17.21	29.41
民國77年	669(27.72)	832(34.48)	912(37.80)	7.33	19.05	30.96
民國78年	699(29.19)	767(32.03)	929(38.79)	7.68	17.41	31.77
民國79年	772(30.36)	862(33.90)	909(35.75)	8.49	18.73	33.14
民國80年	833(30.36)	961(35.02)	950(34.62)	9.18	20.68	35.04
民國81年	693(27.94)	896(19.28)	891(35.93)	7.64	36.13	32.79
民國82年	864(35.01)	818(33.14)	786(31.85)	9.54	17.45	29.27
民國83年	871(37.45)	777(33.40)	678(29.15)	9.20	17.15	27.79

*：地區的相對貧窮率

鄉村與城鎮地區的勞動市場無法提供較多的工作機會，也是造成鄉村與城鎮居民遷往都市的原因之一。最後，都市地區的勞動市場充斥許多低薪資的服務業工作機會，亦可能造成居住都市地區居民淪為貧窮的困境，特別是近幾年來由於台灣經濟的不景氣，更造成許多以服務與銷售職業工作者陷入貧窮中。

伍、結語與未來研究的方向

本研究運用相對貧窮線與即將修正的低收入戶標準來分析台灣相對貧窮戶的現況與變遷。首先，藉由相對貧窮的測量，適時彌補目前因低收入戶標準過於嚴苛，以及無法計算出維持不同家戶類型所需最低生活費用的缺憾，同時，並模擬即將修正的低收入戶標準來分析這群將納入社會福利網的低收入戶的特性。相信透過此相對與絕對雙重貧窮線的測量，將擺脫以往只專注在小貧、大貧與赤貧的低收入戶貧窮研究，並能夠提供給學界與社會福利行政者對這些有工作卻處於貧窮狀況或邊緣的相對貧窮家戶有一初步的瞭解。

研究發現指出，台灣貧戶率從民國七十六年的一三·五%，增加到民國八〇年的一六·七〇%，反映出那段期間台灣股市、房價飆漲，以及財富快速累積下，所造成的財富分配不均與眾多的貧窮家戶。儘管，貧戶率已逐漸緩和，但是民國八十三年，仍然有一四·一五%的家戶或三百四十多萬的民衆生活在貧窮的困境中。相較之下，低收入戶的貧戶率卻從民國七十三年的一七·九%一直下降到民國八十三年三·六五%。儘管，修正後的低收入戶標準已經放寬

，且接受社會福利照顧的家戶數也由〇·五%—〇·九%家戶大幅的增加到三·六%—七·九%。然而，從資料結果顯示，這項低收入戶最低生活費標準並不能靈敏反映台灣的貧窮狀況。也因為隨著低收入戶貧戶率的下降，隱性貧窮家戶的貧戶率從民國七十三年的一六·九一%緩慢的增加到民國八十三年的一〇·五六%，這結果顯示出，未來隱性貧窮家戶的問題將日趨嚴重。

在民國八十三年，經濟戶長的年紀越高與家庭負擔較重的中壯年家戶、教育程度越低、從事農業生產以及非技術性與體力勞動職業者，有較高的機會淪落在貧窮的困境中，此外，經濟戶長為女性的家戶已經成為主要的貧窮家庭類型，特別是老年的女性單親與雙親家庭，並且家戶居住在鄉村地區有較高的機會淪為貧窮狀況。經由長期的分析，台灣貧窮家戶特性的變遷可以歸納為：(一)隨著台灣進入高齡化社會，貧窮家戶將邁向高齡化的趨勢，(二)教育程度對貧窮家戶的影響力減弱，中等教育程度戶長淪為貧窮機會大增，(三)工作貧窮問題將隨著就業市場與勞力需求的改變而日趨嚴重，特別是藍領階級的家戶淪為貧窮的機會大增，(四)農家貧窮雖已獲得改善，但貧戶率仍高居就業職業類型的首位，未來隨著台灣進入國際市場，農家貧窮預期將更為惡化，(五)女性貧窮問題將隨著女性家戶數增加而逐漸受社會重視。然而在欠缺好的工作、丈夫工作報酬、以及針對女性單親家庭的社會福利津貼之下，女性單親家庭容易淪為貧窮狀態之中，最後(六)鄉村、城鎮、都市貧戶率的消長指出，未來都市貧窮問題的研究將日趨重要。

綜合上述貧窮家戶現況與變遷的討論，本研究認為，未來貧窮家戶的研究應該朝向三個研究方向來發展。首先，增加結構性因素對貧窮家戶影響的探討（陳寬政、蕭新煌，一九八五），也就是從勞動市場與產業的經濟結構觀點來解釋工作結構（Structure of Work）對家戶經濟的影響（Gorden, 1972; Beck et al., 1978）。雖然不少研究已經企圖以市場與區位的因素來解釋低收入戶的致貧原因（張清富，一九九五），但是，對於市場結構解釋能力，以及即將修正低收入戶與廣大的隱性貧窮家戶的研究仍嫌不足。

其次，增加地區貧窮的研究與理論的解釋，除了地區產業結構變遷對該地區貧窮率的影响外（蔡明璋，一九九五），應該嘗試去探討該地區其他與生產有關的政治、經濟、社會等影響因素對地區貧窮的影響（Lobao, 1991）。例如：政府重大的經濟建設方案（如：工業區的建立）或政府部門工作機會對地區就業結構與家戶經濟福祉的影響，地區人力資源品質與工會運作能力對就業市場的制衡力量，以及該地區可運用的社會福利資源的多寡與社福計畫性質等，皆會對該地區貧窮率有不同程度的影響。

最後，增加對貧窮家戶使用社會福利資源與計畫的研究。當低收入戶不再侷限在老、殘、疾病等家庭時，現行的社會福利計畫必需從「補殘式」的計畫轉變變成「功能服務式」計畫導向，也就是依照這些工作貧窮家戶的特殊需要而提供服務。特別是對於新興的家庭類型，如：女性單親家庭，或需擔負眾多子女教養費用的工作貧窮家戶，應該針對其階段性的需要，提供適時的社會福利計畫與資

源來幫忙他們度過困境，例如：設立公共的托育機構來鼓勵或方便單親婦女就業，或提供教育經費的減免來減輕工作貧窮家庭的經濟負擔等服務事項（陳建甫、高淑貴，一九九六）。此外，由於受限於經費與人員不足，目前社會福利單位只專注在低收入戶的輔導工作，而忽略這群處於低收入戶邊緣的隱性貧窮家戶，在未來如何預防這些隱性貧窮家戶「有意」或「無意」淪落入低收入戶，將是社會福利單位未來重要的工作之一。

（本文作者係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鄉村社會學博士，現任台灣大學農業推廣學系博士後研究員）

註釋：

註一：台灣省、高雄市與台北市的低收入戶標準不完全相同。台灣省與高雄市是依社會救助法辦理，而台北市則是依照該市前一年家庭收支調查平均經常性支出之百分之四十來訂定。

註二：「絕對貧窮」源自於生計貧窮（Subsistence Poverty）的觀念，當個人所擁有的資源無法維持一個特定的最低生活所需（Minimum, necessities）或消費水準時，便處在生計貧窮的狀況。這些最低生活或消費所需，主要包括：食物、衣服、房租與燃料等。這種最低生活所需的測量方式已成為各國訂定貧窮線的標準。例如：一九六三年美國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ors (CEA) 所訂定的每人每年\$11,000元貧窮線，便是根據一個典型美國家庭最低食物花費乘以三倍而訂定（Schiller, 1989: 21）。而在我國的社會救助法中

，低於最低生活費用者為低收入戶的定義，便是根據此概念所訂定。然而，最低生活費用標準的訂定卻是使相對位置來獲得，例如：目前標準是以所得的三分之一來計算，而即將修改的標準是以消費的六〇%來計算。

註三：本研究選擇以民國七十三年為起點，是因為從七十三年以後每年的樣本數皆固定為一六四三四戶。有關其調查抽樣方法與問卷內容，請參考「中華民國台灣地區個人所得分配調查報告」之附錄二，頁二六四—二七三。

註四：可支配所得＝已分配要素所得＋經常移轉收入－經常移轉支出

已分配要素所得＝基本所得＋財產所得收入－財產所得支出

基本所得＝受雇人員報酬＋產業主所得

註五：由於民國七十七年以前的資料並沒有記錄經濟戶長的婚姻狀況，因此僅就民國七十七年到民國八十三年間的資料來加以分析。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 張清富 貧窮類型別差異的決定因素 法商學報 一九九二 頁一四七—一六四；台灣貧窮的決定因素：個體論抑或結構論 收錄於林松齡與王振寰編輯的「台灣社會學研究的回顧與前瞻」論文集 一九九五 頁一二九—一五〇
- 蔡明璋 產業結構與台灣的區域貧窮率：William Wilson 理論檢證

收錄於林松齡與王振寰編輯的「台灣社會學研究的回顧與前瞻」論文集 一九九五 頁一〇三—一二八

林松齡 台灣中部地區貧窮現象之研究 台灣銀行季刊 三一(三)

一九八〇 頁一八九—二二三；貧窮問題 見楊國樞、葉

啓政主編「台灣的社會問題」 一九九一 頁三〇—一三二

五

朱雲鵬 貧窮問題之探討：台灣地區資料之因素分解研究 中研究

專題選刊第七一號 一九八七

陳淑英 突破貧窮的惡性循環：貧窮之因徑分析 社區發展二四期

一九八三 頁六三—七〇

陳寬政、蕭新煌 台灣的所得分配與貧窮問題：觀點與證據 見蔡

文輝、蕭新煌主編「台灣與美國的社會問題」 一九八五

頁三五—四六

陳琇惠 訂定貧窮線之方式與標準的探討 社區發展研究訓練中心

一九八六

萬育維、李孟修 老年貧窮與社會支持網絡運用之回溯分析—質化

研究之初探 社區發展 九月 一九九三 頁三一—四三

廖偉君 有工作的貧窮雙親家庭之研究 台北東吳大學社工研究碩

士論文 一九九二

蔡宏進 鄉村衛生醫療與福利及其變遷理論與實際 社區發展 四

五期 一九九四 頁六九—七七

行政院主計處 中華民國台灣地區個人所得分配調查報告 一九九

四： 中華民國社會指標統計 一九九五

台灣省社會處 中華民國台灣省社會福利指標 一九九一

黃進豐 台灣省七十九年低收入戶調查研究報告 台灣省社會處
一九九一 頁二〇一—二〇七。

莊淑晴 女性戶長單親家庭問題之探討 台大社會研究所碩士論文
一九九一

林萬億 社會救助法修正之研究 內政部社會司 三月 一九九一
頁五：福利國家—歷史比較的分析 台北 巨流 一九九一

四

余玉賢 台灣農家所得分配之區域差異 台灣所得分配會議論文集
台北 中研院經研所 一九七八 頁二八六—三〇四

溫秋蘭 家戶相對貧窮與家戶人口結構關係之探討 中正大學社福
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建甫、高淑貴 雙親家庭幼兒照顧類型與費用之研究—比較貧窮
、瀕臨貧窮與非貧窮家庭 社區發展 七五期 一九九六

英文部分

Atkinson, Anthony B. (1991) "Comparing poverty rate
internationally lessons from recent studie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5(1): 3-21.

Bane, Mary Jo. (1986) "Husehold composition and poverty" pp. 2
09-231, in S. H. Danziger and D. H. Weingerg (eds) Fighting

Poverty: What Works and What Doesn't. Cambridge, MA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eck, E. M., Patrick M. Horan, and Charles M. Tolbert II (1978) "
Stratification in a dual economy a sectoral model of earn-
ing determin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3(5): 7
04-20

Becker, Gary (1964) Human Capital. New York: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Ellwood, D. T. (1988) Poor Support: Poverty in the American
Family.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Garfinkel, I. and S. S. McLanahan (1986) Single Mothers and their
Children: A New Dilemma. Washington: Urban Institute Press

Garfinkel, I. and S. S. McLanahan (1988) "The feminization of
Poverty: nature, causes and a Partial cure," pp. 27-52
in Donald Tomaskovic-Devey (eds), Poverty and Social
Welfare in the United States. Boulder: Westview Press.

Glewwe, Paul and Jacques van der Gaag (1988) Confronting
Pover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Definitions, Information
, and Policy. Living Standards Measurement Study (LSMS)
Working Paper No. 48. The World Bank.

Gorden. David M. (1972) Theories of Poverty and Unemployment

- , Lexington, MA: D. C. Heath and Company.
- Hauser, Richard, and Peter Semrau (1988) "LOW-income groups and the Poor in Germany 1992-1983"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ARIW meeting, Lahnstein, Germany. [See Atkinson (1991)].
- Levitan, Sar A. and Shapiro, (1987) Working but Poor: America's Contradicti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Lipton, Michael, (1988) The Poor and the Poorest: Some Interim Findings. World Bank Discussion Papers.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1977) Why Poor People Stay Poor: A Study of Urban Bias in World Development. London: Maurice Temple Smith Press.
- Lobao, Linda M. (1990) Locality and Inequality-Farm and Industry Structure and Socioeconomic Condition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McLanahan, Sara, Irwin Garfinkel and Dorothy Watson (1988) "Family structure, poverty, and the under-class" pp. 102-147 In Michael G. McGeary and Laurence E. Lynn, Jr (Editors), Urban Change and Poverty.
- McLanahan, Sara S. (1985) "Family Structure,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pover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0: 873-901.
- Pearce, Diana (1978) "The feminization of poverty: Women, work, and welfare" Urban and Social Change Review (11): 28-36
- Ravallion, Martin (1992) Poverty Comparisons-A Guide to Concepts and Methods. Living Standards Measurement Study (LSMS) Working Paper No. 88. The World Bank.
- Tickamyer, Ann and Janet Bokemeier (1988) "Sex differences in labor market experiences. " Rural Sociology. 53 (2): 166-189. Tickamyer, Ann R. and Cynthia M. Duncan (1990) "Poverty and opportunity structure in rural America "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6:67-86.
- Townsend, Peter (1987) "Deprivation. "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16(2): 125-146.
- U.K. Department of Social Security (1990), Households Below Average Income. A Statistical Analysis 1981-1987. London: Department of Social Security. [See Atkinson (1991)]